上篇：理论探讨

一、我国宗教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地位

宗教作为人类所共有的社会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宗教历史源远流长。

(一)我国宗教的历史传统

1. 我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崇拜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渊远流长，探其根源，必然会走入宗教神话、远古传说的迷宫。中国古代宗教神话中的诸神大体可分为三类，由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的人格神，由信仰天地万物而演化来的自然神，与图腾崇拜相关的动物神。

古人对开天辟地的盘古，以石补天的女娲的崇拜，对三皇（火神燧人氏·渔猎神、占卦神、人类始祖伏羲氏·古代农业和医药之神神农氏）五帝（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的祭祀和崇拜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人格神灵、祖先神灵的崇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炎黄子孙”之称，表现着中华儿女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自豪之感。

古人对日、月、星神的崇拜，对风、雨、云、雷等神灵的崇拜，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昆仑、蓬莱等神山的崇拜，对黄河、长江、湘江、洞庭湖等江河神的崇拜，对各种花草树木等植物神的崇拜，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神的崇拜，亦表现出中华儿女对自己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古人由 28 种动物与 28 个星座相连构成了动物的神灵系统，由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龟蛇合体之物)构成了东西南北四方神，由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12 动物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2 生辰相结合构成了 12 生肖。古人还把龙、凤、麟、龟称为四灵，形成了民族的动物信仰崇拜形式。今天，同为“龙的传人”，成为凝聚亿万中华儿女、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大精神动力。

2、我国现存宗教的历史渊源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目前我国现存的宗教主要是五大宗教,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除道教为中华民族自身土生土长的宗教外，其他宗教都属外来宗教，且可归纳入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世界三大宗教很早就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渐扎根、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延革，佛教也得以不断发展，迄今对我国社会仍有着重要影响。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6～5 世纪的古代印度，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为“释迦族的贤人”。公元前 3 世纪,印度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对外传播。佛教,逐渐传入亚洲各地。佛教传播大致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南传首先传入斯里兰卡，再由此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后经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北传又分为两条途径，一条由印度西北部越过阿富汗进入我国新疆，再由河西走廊到达内地，后由中国本土传入朝

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另一条是由印度直接北传入尼泊尔，后进入我国西藏，再由西藏传入内地和蒙古及西伯利亚等地。佛教传进中国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1] 自公元前 1 世纪西汉时期，至今 2000 多年间，佛教在我国深深扎下了根，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宗派。禅宗的创立和藏传佛教的形成，确立了我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重要地位。

基督宗教产生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在长达 2000 年的历史中，基督宗教发生了两次大的分化，第一次为 1054 年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由此形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教派。第二次指欧洲 16～17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提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宗教改革措施，使其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批新教派。基督宗教传入我国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前后经历了四次传教。基督教来华最早为唐朝的“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 635 年传入我国，该派从叙利亚传入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再从波斯传入我国；后于 845 年被周武宗‘灭教’所亡，前后存在了 210 年。第二次为元朝的‘也里可温’（蒙古语‘有福缘之人’的音译，元朝时蒙古人对基督教徒的专称），元世祖之母是虔诚的景教徒，随元朝兴起基督教传入，后随元朝覆灭基督教消亡，前后约 100 年。第三次传入为明清时期，耶稣会士于 1551 年来华传教，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取得成功，后因“礼仪之争”教皇发出中国天主教徒禁拜祖宗的“禁令”，引起清代朝廷不满，雍正宣布禁止洋人传教的‘禁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教禁时期。第四次传入为 1840 年以后，鸦片战争使中

(1) 见任继愈总主编、杜继文本书主编：《佛教史》，第 95 页。

国紧闭了百年的大门打开，基督宗教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踊入我国，开始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畸型发展，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对“洋教”的抵触心态，也是近代史上“教案”不断的根源所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我国不少基督教徒开始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使基督宗教在我国得到很大发展。

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 7 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创始人为穆罕默德，创立至今已有近 1400 年的历史。该教创建之前 500年,阿拉伯民族与我国就有了来往，创立后不久便传入我国。虽在确定传入时期上存在分歧，但多数学者认为至少在唐朝 651 年时已传入我国，至今已有近 1350 年的历史。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路线分为海路与陆路两条，海路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到我国南海,传入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陆路由波斯及阿富汗，抵达新疆天山南北，再经青海、甘肃直至长安（今西安市）一带,即“丝绸之路”。伊斯兰教在我国先后被称为“大食法”“西域教门”“回回教门”“回回教”“天方教”“清真教”“回教”等。我国有一些少数民族普遍信仰或部分成员信仰伊斯兰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与信仰民族及居住地区的风俗习惯已融为一体。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形成于我国东汉顺帝年间，延绵至今也有近 2000 年的历史。道教深深植根于我国古代宗教神话、民间巫术、哲学思想、医学体育等文化基础之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盛行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农业祭祀占重要地位的社稷神崇拜，成为道教产生的重要渊源。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也是道教在世界宗教中的独具魄力的特色，它与中国古代昆仑、蓬莱等极富魄力的神仙世界传说关系密切。道家原本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派别，而其神秘的“道”及清净无为、消遥

遁世的人生态度，使之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被神化，尊为道教的教主，其著作尊为道教的经典。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道教不仅不与其为敌，而且将其视为吸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来源，对佛教的态度亦如此，不少道教派别将儒、佛思想经典融入道教经典之中，提出佛、道双修的主张。如全真道创立者王重阳倡导"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出以道教经典《道德经》、佛教经典《般若心经》和儒教经典《考经》为全真道教徒必修经典。道教追求养生健身、健康体魄，讲究修炼，以求长生，因此，注重吸收古代医药学与养生学的思想营养，创造了一系列有利于强身健体的内外丹术，为中医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黑色火药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二）我国当代宗教的状况

当今，世界总人口约为 61.5 亿人，其中宗教信仰者约为 48.09 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78.1%。[1]

1. 我国宗教信仰的民族性特征

目前，我国人口为 12.5 亿，现存的五大主要宗教的信教人数达 1 亿余人，在我国全民中的比例约为 10%，属少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56 个民族中汉族人最多，约占全国人口的 92%，而汉族外的 55 个民族人口总和仅为全国人口的 8%。从我国宗教分布的实际情况看，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质。我国信教人数中少数民族所占比重较大，在 55 个少数民族中，全民性普遍信教的民族就有 20 余个，信教人数的比例远远超过了汉族，且居住地区

[1] 参见美国《教会研究国际公报》1996 年第 1 期，转引自《世界宗教文化》1998 年第 1 期，第 6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亦相对集中。如我国的佛教包括三大语系，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其中两大语系属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藏语系佛教居住地区集中在我国西部，是由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门巴族等民族构成，信仰群众约为 700 万人；巴利语系佛教居住地区集中在我国西南部，是由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阿昌族等民族构成，信仰群众约为 150 万人。再如我国的伊斯兰教，全民性普遍信仰的有 10 个少数民族，即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别孜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约 1700 万人；另外，蒙古族、藏族、白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的部分成员也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的居住地区集中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或西南地区。

综上所述，我国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息息相关，尤为与少数民族问题关系密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道德、习俗，乃至经济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我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说到底，既是民族问题、也是宗教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宗教无小事”，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处理好各项复杂的宗教事务。

2. 我国现存宗教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天主教信仰人数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的发展，其教徒人数约为 380 万人（1949 年的信教人数为 270 万），神职人员约为 2700 人，天主教堂约为 4000 余座。天主教在全国范围开办的神哲学院有 11 所，修女院数十个。天主教有两个全国性组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 1957 年，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于 1980 年。

目前，我国基督教信仰人数与过去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教徒人数约为 1000 万人（1949 年的信教人数为 70 万），教牧人员 5000 余人，教堂 8000 余座，简易活动场所 2 万余处。基督教在全

国范围开办的基督教神学院 13 所基督教有两个全国性组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 1954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于 1980 年。

目前，我国伊斯兰教信教人数约为 1700 万人，阿訇约为 4万人，清真寺约为 2.6 万余座。伊斯兰教在全国范围开办经学院 9 所伊斯兰教全国性组织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于 1953 年。

目前，我国佛教信仰者在少数民族地区约为 850 多万人，汉族地区因无严格的登记制度而无法准确统计。我国佛教有 17 万僧尼，寺院有 9500 余座。佛教在全国范围开办的佛学院有 14 所。佛教全国性组织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于 1954 年。

目前，我国道教住庙道士、道姑为 6000 余人，宫观为 600 余座，主要教派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道教信仰人数因广泛分布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村中，又无严格的统计制度和方法，因此难于确切统计(根据 90 年统计，我国民间信仰人数为 1.8 亿人）。我国道教的全国性组织为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于 1957 年。道教协会开办了中国道教学院。

3. 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中国宗教界

我国宗教界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49 年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起，就有宗教界人士的代表参加， 20 世纪 50 年代后，五大宗教的全国性组织的建立，即成为人民政协的团体成员。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中的宗教界委员逐年增加，从第 1 届的 3 人增至第 9 届的 60 人(其中常委 16 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丁光训主教先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市县人民政协中的宗教

界委员达数千人。[1]

1985 年 8 月，全国政协宗教组（宗教委员会前身）发起，组织全国五大宗教团体，动员全国各地广大信教群众，为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捐献字画。这一活动得到全国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响应，取得了圆满成功。[2]

1995 年 8 月 14 日，全国政协的宗教委员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宣读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文告》指出，一切真正宗教的教义的共同特征和基本精神是和平。维护世界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此，采取以下举措：组织和平祈祷，今后每年 8 月 14 日到 8 月 20 日为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参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支持我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爱国爱教，振兴中华。《和平文告》得到了全国宗教界的热烈响应。[3]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我国各教信徒爱国爱教，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服务社会服务人群，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佛教团体开展了弘扬佛教精神，积极服务社会的公益活动。某省佛教协会提出开展创建文明寺庵活动的《方案》及“爱国守法”“民主管理”“自身建设”“热心公益”“环境美化”5 条文明标准。全国各大名山佛寺，以及许多大城市中的著名古刹，在积极美化环境、

①赵匡为著：《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第 138 页，华文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② 同上，前第 139 页。

③ 同上，140～141 页 。

改善服务条件、保护文物古迹、支持地方城镇建设、资助教育和福利公益事业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的道教徒遵循祖师宝训，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积德行善，爱民慈俭，坚持宗教修炼，同时做大量公益服务事业。开荒植树保护环境、义务为当地群众看病、为贫困病人送医送药，解决百姓的饥苦困难。中国伊斯兰教人士在带领各民族穆斯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事业，在建设大西北特别是绿化边疆、建设边疆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中国天主教人士在引导教徒服务人群、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不少天主教徒聚居村被当地评为“双文明村”“五好家庭”“文明之家”“先进个人”。天主教徒在遵纪守法、扶贫济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募捐助教、普及科学等方面涌现出大批先进人物。中国基督教界人士在“荣神益人”、“作盐作光”的教义精神鼓舞下，在服务人群、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他们在引进国外资金与外籍教师，在帮助农村打井、扶贫、救灾等方面得到社会好评。1998 年夏，我国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广大宗教界人士与信教群众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捐款捐物、义卖义演，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体现了中国各宗教的宗教界人士与信徒的爱国主义精神。①

（三）北京宗教的地位

1. 北京宗教的历史与现实地位

北京曾是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朝代的国都，1949 年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北京城已拥有众多寺

①赵匡为著：《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第 142～145 页。

庙教堂。各种宗教名胜古迹成为北京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当今，作为祖国的首都，北京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宗教在其中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我国宗教界的各种全国性团体组织机构大多设立在北京，起着统领全国宗教界的作用。

作为首都，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各国驻华领使馆和文化机构设在北京，各国外交官员和文化人士相对集中于北京，外商外企亦在北京有不小的数目。面对目前世界人口中近 4/5 的宗教信仰者，与外国人的交往也是与宗教信仰者的交往，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学会与宗教信仰者相处显然十分重要。况且各国宗教界人士来我国进行国际间交流访问，亦常常将北京作为目标之一。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窗口，北京宗教问题处理如何、政策落实情况，代表着国家形象，影响着全国局面。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是中外众多旅游者的游览中心，北京的雍和宫、白云观、云居寺、卧佛寺、佛香阁等，在中外旅游者心目中，早已成为北京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具体象征。

2. 目前北京宗教信仰状况

(1) 北京宗教信仰人数

目前北京人口约为 1250 万，其中信教人数多少？由于统计方法上的不同，结果也不相同，统计方法大致有两种。

一种统计认为，北京信教人口为 50 万人,具体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口为 24 万人，佛教徒为 20 万人，天主教徒为 4 万人,基督教徒为 2 万人,道教徒为 300 人。以此种计算方法,北京市的宗教徒约占北京总人口的 4%。

另一种统计认为，北京信教人口约为 9 万多人,具体是:伊斯兰教教徒为 3 万人，天主教教徒为 4 万人，基督教教徒为 2 万人，

佛教教徒为 1000 人、道教教徒为 100 人。以此种计算方法,北京市的宗教信徒占北京总人口不足 1%。

为什么会出现统计中的悬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一种方法采用了把信教的民族全部统计在内的方法。如所有的回族都统计在伊斯兰教教徒之内,事实上,回族中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仅为 3 万人,回族中有不少无宗教信仰者,也有少数人改信他教,所以 24 万的统计方法有其不准确的成份。其次,后一种是以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为统计标准。但因佛教和道教是一种组织较为松散的宗教团体,教徒没有固定的宗教活动组织机构,是不是教徒不用注册登记,而教徒的宗教活动可以在宗教活动场所,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中为此,佛教和道教教徒的人数难于统计。如按经常参加活动人数进行统计,显然会低于实际情况。再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统计方法,以其受洗时登记的教堂所在教区的记录为准。据了解,北京的外地务工人员为 300万人,他们中的教徒虽可参加北京教区的活动,却不能被统计在北京的教徒之中。加之一些国内外旅游者参与北京宗教场所的活动,也进一步渲染了北京宗教活动的气氛。因此,受上述各种因素的制约,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确实难免,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用此统计数字来分析北京宗教信仰的一些现实情况。北京的信教人数低于全国的平均数,目前,我国信教人数为 1 亿多人,约占全国 12.5 亿人的 10%。而北京的比例低于全国,原因何在。首先,是政治原因所致。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央各级机关与新闻媒体的集中地,是共产主义信仰影响最强烈的地方。其次,是历史原因所致。在历史上北京为汉民族集中居住区,虽然元朝时的蒙古族、清朝时的满族曾统治了这一地区,但事实上,是蒙满接受了汉文化传统。为此,北京地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与全民性信教的少数民族居住地相比，信教人数比例偏低应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另外，从北京宗教教徒入教年限看，信徒中的绝大多数为近十余年入教，约占信徒总数的 3/4。这一现状来自于历史原因，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入教人员，我国宗教教徒截然被分为两大段，文化革命前人教的老教徒和改革开放后人教的新教徒。

（2）北京宗教团体及宗教院校机构

北京是祖国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宗教团体组织机构设置相对集中的地方，并设有数所宗教院校。

全国性宗教团体共有 7 个，其中大部分机构设在北京。

北京市宗教团体 4 个,北京市佛教协会,成立于 1981 年;北京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于 1954 年；北京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 1951 年；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 1956 年。

另外，北京有两个基督教群众团体，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

全国各大宗教在北京都设有宗教院校。

中国佛学院，成立于 1956 年，文化革命后 1980 年恢复教学，设 2 年制预科班,4 年制本科班和研究生班。院址设在北京市法源寺内。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于 1987 年。院址设在北京西黄寺。

中国道教学院，成立于 1990 年,学制 2 年。院址设在北京市白云观内。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于 1955 年,1982 年开始设立本科班,学制 5 年。院址设在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西街 103 号。

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于 1986 年。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成立于 1981年,学制 6 年。院址设在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 3 号 。

北京教区神哲学院，成立于 1981年,学制 6 年。院址设在北京市朝阳区。

燕京神学院，成立于 1953 年(1981 年为北京市基督教神学院),复教于 1986 年,学制为 4 年。院址设在北京市昌平县清河镇。

(3) 北京宗教教职人员

北京各大宗教教职人员共计 400 多入。从北京宗教教职人员年龄结构看，平均年龄较为合理，但却呈现出一种两头大中间小的倾向。一方面,60岁以上老人占较大比例，且多数居于重要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35 岁以下的青年所占比例较高，约为 50%以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较少。很显然这一情况与我国宗教界近十余年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文化大革命的 10年,宗教受到迫害,宗教教徒的正常宗教活动被停止，几乎没有入教人员，因而出现断层现象。从北京宗教教职人员的学历层次看，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较好，基本上能胜任北京宗教界的需求，但也存在着不均衡和水平较低的情况。天主教和基督教情况较好，学历层次相对较高。

3. 当代北京宗教状况及发展

目前对北京宗教信仰现状的评价，可用六个字来概括：正常、平稳、健康。具体从几方面来看：

(1) 爱国爱教建设首都

“爱国爱教”是我国宗教界的一贯方针，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的宗教界就是我国反帝爱国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建国后，摆脱了过去剥削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控制的宗教界，走“爱国爱教”之路，使宗教完全成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此后，独立自主、自治自办成为我国宗教发展的重要原则。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爱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加强民族团结，成为我国宗教界人士及团体的行动准则在十年浩劫中，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宗教界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遭迫害。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宗教界人士仍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希望投身于祖国建设之中。改革开放后，宗教界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贡献力量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北京宗教界爱国爱教相统一的表现，他们积极引导教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动参与首都社会主义建设。许多教徒在生产建设中积极努力，成为该单位的劳动能手。在大是大非面前，北京宗教教徒具有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及较高的思想素质,如 1999年 5月 7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馆舍的严重毁坏和人员的伤亡。这一事件，引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也引起了我国宗教界的无比愤怒。5月 10 日下午，由北京各神学院的师生和北京市宗教界人士组成了数百人的游行队伍，他们义愤填膺、士气激昂，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门前通过，振臂高呼“中国人民不可辱”、“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口号，以此表达他们的爱国心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中国佛学院延藏法师说，历史上的佛教从来都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祖师道安法师就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我国主权遭践踏，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站出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孟神父说，宗教虽无国界，但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因此，我们首先是为了国家活着，然后才是我们热爱的宗教。燕京神学院的赵泽彬同学说，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的，要求人要爱国。道教学院的学生马道士说，只有国家的安定，才有宗教的繁荣。北京佛教协会会

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表达了宗教界的共同心声，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行径决不能容忍，一定要与全国、全世界人民一道消灭霸权主义恶魔。[1]

北京宗教界的教职人员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较高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学习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并与其布道讲经相结合，在引导教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起了重要作用。如讲清计划生育的好处、积极参加生产的意义、要为修建道路和桥梁捐资出力等等，配合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其人格魅力和学识才华，得到了本地区信徒的尊重和信赖；同时，他们的工作效果和作用，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

（2）遵纪守法服务社会

宗教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道路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以禁忌、劝诫、清规、戒律等方式，来规范信教人的言行，弃恶从善，积德行善，摈弃世间的各种物质欲望，从而追求精神生活中的最高境界，以求死后的灵魂解脱。这些宗教伦理道德，起到了净化教徒心灵，规范教徒言行，遵守社会法律法规的作用。客观上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积极效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道德是人类传统文化中宝贵精华，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走访中看到，在北京一些宗教徒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如通州区的贾后疃，顺义区的回民营……教徒自觉遵纪守法，成为文明市民的事例屡见不鲜；也发现了这些村落夜不闭户、家庭和睦、邻里相安的安定团结景象。

就此，也有一些善良人士向我们建议，应当提倡人们信教。理

[1] 《世界宗教与文化》1999 年第 2 期，第 1－2 页。

由如下：目前出现的那些低龄犯罪青年，缺乏自身行为约束，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死后下地狱，也不在乎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为此，他们为了谋财而伤天害理，为了私欲而为所欲为；整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今生有酒今生醉，混过一天算一天。结果很多 20 岁上下的妙龄青年糊里糊涂地走上了犯罪之途，断送了年轻的性命。这些人士认为，如果这些青年相信宗教，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或许因恐惧而有所收敛而得救。记得一位血气方刚的神学生对我说起他的抱负，是想毕业后到我国边疆去做一名牧师，到监狱去做那些罪犯的工作，让宗教信仰解脱犯罪者。

救助他人、行善好施，是宗教普遍的教义要求，也是北京宗教界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捐助灾区、抗洪救灾、希望工程等项活动中，宗教界总是积极热情参与其中。张家口北部的地震、1998 年的特大洪水、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等，都牵动着北京宗教信徒的心，他们积极捐款捐物，为国家和政府排忧解难，同全国人民一起渡过艰难困苦。

（3）国际交往维护和平

我国的五大宗教除道教外，都是历史上从其他国家和地区传入的，属当今几大世界性宗教，国际性是我国宗教的一大特征。由于全国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决定，北京宗教的国际性特征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大窗口。自 1979 年起，北京宗教团体开始恢复宗教活动，国家允许开放一批宗教场所，将一些宗教场所设立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点，出巨资帮助修复了一些教堂、寺庙、墓地等，使其成为接待国际友人的场所。如佛教的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碧云寺、卧佛寺、云居寺等，伊斯兰教的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西花市清真寺、下坡清真寺等，道教的白云观，天主教的宣武门南堂、西什库北堂、王府井东堂、东交民巷堂

等，基督教的米市大街教堂、缸瓦市教堂、崇文门教堂、海淀教堂等等。重新立起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清朝来华传教士的墓碑，并在墓地上建立了基墙和花坛。[1]

自 1979 年以来，北京各宗教团体接待的国家元首、议会议长、政府部长、工商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外国友人不计其数。北京宗教界也派出了各种代表团进行交流访问。通过与我国宗教界的交往，使外国人了解了我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这种国际间的往来，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了解，消除了彼此间的许多误会，扩大了我国在世界的影响，从而增进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青年宗教信仰与“青年宗教热”

宗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据 1996 年统计数字显示，当今全世界宗教信仰者总人数近 48.9 亿人，占全世界总人口 61 亿的 78.1%。我国目前宗教徒为 1 亿多人，占我国总人口 12.5 亿的 1/10。这一比例说明我国信教比例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青年宗教热”，为什么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这一热潮怎样形成？表现是什么？它与青年宗教信仰的关系如何？它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下面将就此进行探讨研究。

[1]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著：《北京的宗教》第 354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